



梦润，就是一个从“奥德赛时期”走出来的年轻人。

她来自新疆，是家里第一代大学生。从家乡到北京读书，一切都要从头学起：大学生活怎么过、职业规划是什么、实习保研留学这些路径意味着什么——对她来说都是全新的概念。

张梦润告诉《新民周刊》记者，本科她选了经管专业，是参考父母老师的建议，憧憬着“未来在大城市写字楼里做一名白领”。可真正开始学习了之后，虽然课程成绩不错，老师同学也都很好，她却渐渐意识到，这似乎不是她真正有热情的事。

大二大三期间，在接触到心理学课程和教育类实践项目后，张梦润发现更喜欢的是教育心理——关于儿童青少年如何成长，家庭和教育环境怎样影响人的发展。找到这个方向之后，她开始了长达十年的“漂泊”：本科、硕士、博士、海外博士后、回国任教，每隔两三年就要换一个城市。“租房子、搬家、装家具……这些事我现在做得很熟练了。”在旁人看来，她的同龄人很多已经有了稳定的生活轨迹，而她还在换城市。但张梦润自己身处其中时，对每一段旅程都满怀期待，“每段旅程都给我带来很多成长，不光是学术上，也有人生体验上的成长”。

记者问她，在漫长的迷茫中，一个人究竟如何辨认

出“真实的自己”？那个所谓的“真实自我”，是一个需要被“发现”的既定存在，还是在一次次行动中被“建构”出来的？

张梦润的答案是：两者都有。

“从发现的角度来说，每个人内在确实有一些倾向性——某些事情会让你天然感到好奇、感兴趣，某些活动会让你进入一种心流状态，沉浸其中忘记时间。”张梦润表示，这种倾向性，可能在某个时刻，如上了一门课、参加了一个志愿活动、读了一本书，就突然意识到“原来我真正喜欢的是这个”——这个可以被理解为是发现的过程。

“但从建构的角度来说，每一次作出选择、采取行动，也都在塑造和改变着我们。”在张梦润看来，自我不是固定不变的，它像一条流动的河流，“每一次行动都可能改变河流的走向”。

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刘汶蓉在接受《新民周刊》采访时，从文化比较的视角提供了另一种观察。她指出，在西方个体主义文化中，假定了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独特的灵魂，所以西方的社会制度设计很鼓励“找到它”的这种探索。“比如，西方有Gap Year（间隔年）的传统，学生可以休学去尝试不同工作，而助学贷款和兼职文化让年轻人早早学会自己养活自己。”刘汶蓉在